

中國評論

反貪污賄賂

一九九六

★ 汪丁丁編 ★

111
C012
233

中國評論

一九九六

汪丁丁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

CA

© 香港中文大學 199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755-X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l.htm>

China Review 1996 (in Chinese)

Edited by Wang Dingd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755-X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 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l.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編輯委員會(按筆畫排列)

宋恩榮

胡素珊(Suzanne Pepper)

郭益耀

孫其樂(Maurice Brosseau)

曾澍基

黃瑞良

齊錫生

關信基

編者的話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是研究者或閱讀者所理解的那部分歷史。《中國評論：一九九六》的作者，從他們特定的角度理解中國，並且（用英文）敘述了他們的理解。雖然時間倉促，譯文難免疏漏，但我們相信這本中文版文集，會成為漢語世界探討中國問題的必要部分。在一個更寬廣的背景下，把熟悉西學傳統的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文章，翻譯成中文出版，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努力之一。我認為這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過程，必須經過：（1）從西方學術語言理解西方社會科學；（2）在中國社會體驗中重新闡釋（包括「創造性誤讀」）西方社會科學；（3）在闡釋和再闡釋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社會科學的語言傳統；（4）把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介紹給西方社會以圖交流的一個融西入中過程。

如果以重大歷史事件作為判斷標準，1995年不算是中國當代進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不過寫這篇「編者的話」時（1996年9月），可以看出許多後來顯得重要的變化，都是經過1995年的醞釀才得以發生的。這正是歷史連續性的體現。這些發生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的重要變化包括：（1）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問題的關注；（2）對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長期問題的關注，以及（3）對中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自主性」的思考。

隨着「金融熱」在1995年的冷卻，人們開始認識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問題——建立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市場的問題，是無法通過表面層次的所謂「搞活金融」來解決的。正如李志文在第十章所敘述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工人失業問題。換句話說，在中國建立要素市場的關鍵，是要建立能夠有效協調勞動與資本、資本與土地，以及勞動與土地之間各種利益衝突的機制。本書的許多文章對此都有論

述，例如「經濟發展與穩定和村民民主自治」、「土地與房地產管理制度」、「國有企業改革」、「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差距」、「改革開放後勞工對工作體驗及其意義的轉變」，以及「1995年中國的農村經濟」。事實上，中國大陸最前沿的學者，正在重新討論「企業家能力」的開發問題，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歸根結底是要建立能夠最大限度地鼓勵企業家創新的制度，所謂「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只是在1996年才變得引人注意起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學家早就明白，收入分配問題絕不僅僅是分配收入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更廣泛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問題。在本書中，有關的論文包括「腐敗與政治」、「社會民主的中國論說」、「中國人的人格與社會變遷」、「中國法律的發展與民法傳統」，以及「江澤民：謀求鄧以後的最高權威」。在經濟發展諸多問題中，產業升級和向高技術投資傾斜的政策，引起了中國經濟學家的關注，他們注意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並不是來自高技術產業，因此不適當地強調高技術，就可能出現典型的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並且造成需求萎縮和經濟停滯，曾澍基在第九章提及了這個問題。最後，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的思考，收錄在本書中的文章可以納入這個範圍。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看，中國學術如同她的政治和對外政策一樣（參見第六章及第七章論文「中國對外政策中的主權：原則與實踐」、「台海兩岸的政治互動」），都可以納入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尋求新的價值認同。在這個大趨勢中反復泛起的主題有：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領土完整和國家權力、社會安定與統一思想，以及在這些主題籠罩下的「政治多元化」、「個人自由」、「人文精神」諸論題。

這就是中國社會，一個處於「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的社會的諸種問題。本文集的作者很清楚地為讀者勾畫出他們論述的問題的「過渡性」，並且很自覺地將1995年僅僅當做這一過渡的一個時刻。只有在這種眼光下，人們才可能理解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人們可以讚歎和分析「中國的奇蹟」或「中國的模式」，但是必須牢記：所有發生在中國的奇蹟或模式，都僅僅是過渡性質的，只有耐心去

探究那些更為根本的因素，才可能判斷中國的未來。而探究那些更為根本的因素，這不是一群佔據了特定觀察角度的學者能夠獨立完成的。知識越是帶有根本性，就越需要從不同角度去探討。這就是「交流」的意義。當我們思考時，我們必須交流。「人應當同時說和思那具體存在着的存在」（巴門尼德《殘篇》）。這就回到了我在這篇「編者的話」開頭所說出版《中國評論》中文版的旨趣。

汪丁丁

1996年9月21日

識於德國杜依斯堡

作者及編者簡介

(按漢語拼音排列)

張建新 畢業於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博士研究生，曾於中國科學院心理學院工作十年，研究範圍有個性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並在發展中國CPAI及修訂中國大陸MMPI-2上擔當重要角色。

張妙清 明尼蘇達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及心理系講座教授。合編 *Psychology and Health*，及為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and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任顧問編輯。她研究的範圍包括人的個性評估、臨床心理學、軀體及性別研究。

陳弘毅 198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系，並於1982年獲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學位，香港律師資格；從1984年起在香港大學法律系任教至今，現為該系教授及法律學院院長。曾出版五本書及四十多篇論文，探討香港及中國大陸的法律制度及法學思想。

胡敦震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研究範圍有經濟發展理論、過渡經濟學及中國經濟。

鄭振權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人口科學系理學博士。澳大利亞Griffith University現代亞洲研究學院副主任，講授亞洲人口及社會科學方法學。他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課，及在國家統計局為聯合國開辦有關人口統計的課程。

李志文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教授、Tulane大學商學院Freeman講座教授及副院長，曾任教於賓夕凡尼亞大學Wharton學院及芝加哥大學商學

院。出版論文超過一百篇，並刊登在 *Journal of Busines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ccounting Review*, *Journal of Finance*, an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並曾為美國商務部、美國能源部、中國財政部、台灣財政部、台灣中央銀行、聯合國、世界銀行等機構及多家中國國有企業的顧問。

梁覺 伊利諾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現為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副編輯，並合編 *Innova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合著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研究範圍有公平與衝突方案、組織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

梁淑美 現任職於香港浸會大學，講授組織行為及商業策略課程。梁氏畢業於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現於 Lancaster University 修讀博士學位，研究課題是從女權主義理論，探討中國婦女行政人員擔負的角色。梁氏的研究興趣還包括亞洲地區婦女的地位、國際談判行為與策略管理。

劉佩瓊 香港理工大學商業研究學系助理教授及助理主任，並獲中國委任為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香港代表，她研究的興趣主要是中國的土地使用問題、外商投資及區域研究，最近著作有《中國經濟大趨勢》1994，1995及1996(編輯)，*The Fifth Dragon* (與人合著)，《廣東經濟投資總覽》。

明居正 Notre Dame大學博士，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科學教授，著有《國際政治制度的轉變：雙極崩潰及未來新世界秩序》，並有文章研究中國政治、國際關係及海峽兩岸的關係。

任越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香港嶺南學院政治及社會學系大學講師。曾任職於維珍尼亞理工學院及國家大學，研究範圍有國際組織、國際法及比較外交政策。

宋維真 北京師範大學碩士，中國科學院心理學教授，領導個性研究小組的工作。學術研究的範圍包括有個性心理學及臨床心理學，並統籌明尼蘇達多向個性測驗及中國的CPAI發展。

汪丁丁 經濟學博士及數學碩士。研究領域包括：微觀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政治與道德哲學。一直堅持以中文發表學術成果，已發表的文集有：《經濟發展與制度創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永遠的徘徊》（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在經濟學與哲學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正在組織撰寫《中國社會學叢書》，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目前在德國杜伊斯堡大學經濟系暨東亞研究所訪問研究。1997年將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同時兼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謝東 畢業於北京大學，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現為中國科學院心理學院助理教授，並在個性研究小組擔當主導的角色及為中國的CPAI發展作出努力，研究範圍有個性及臨床心理學。

由冀 新西蘭Christchurch, Canterbury大學政治科學系講師，發表很多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的研究著作，有 *Dismantling the Party/State: China's Enterprise Reform* (Routledge, forthcoming) 及 *Winning the Next War? The PLA in Quest of High-tech Military Power*。

曾樹基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著有四本書有關香港、中國及多篇論文關於比較經濟制度、貨幣經濟、非均衡計量經濟學、中國改革及中港之間的經濟關係。

鍾謙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其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取得碩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研究助理。

Claude Aubert 專攻農業學，現任 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RA) 研究主任，主要研究農業社會及經濟。他

研究的範圍包括台灣及中國大陸，並有多篇論文關於中國農業。

Hans Hendrischke (杭智科) 現為澳大利亞悉尼麥克里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曾於中國居住及工作，他的研究及著作是有關中國的政治及經濟改革。他並且是澳大利亞出版的商業雜誌 *Access China* 的編輯。

Jean Oi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休假），現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客座副教授，著作有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nd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centives for Industria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Andrew Wedeman 洛杉磯加州大學政治科學博士，林肯Nebraska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著作有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近期研究集中在毛澤東死後在中國出現的地方保護主義、政府的腐敗與失誤。

Bob Westwood 是在英國接受教育，取得心理學學士和碩士、以及管理學博士學位。一九八三年起便在亞太地區工作，及至一九八八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晉升為高級講師。他計劃的研究包括組織內部權力的差異、持續與變化，以及集中與分散。

中國一九九五年主要統計數據

序號	項目	單位	數量	增長率(%)
1	年底總人口	億	12.112	1.1
2	國內生產總值(GDP)	億元(人民幣)	5,773.3	10.2*
	GDP：第一產業	億元(人民幣)	1,136.5	4.5*
	GDP：第二產業	億元(人民幣)	2,827.4	13.6*
	GDP：第三產業	億元(人民幣)	1,809.4	8.0*
3	糧食產量	億噸	465.0	-4.5
4	棉花產量	萬噸	4.5	3.7
5	工業增加值	億(人民幣)	2,471.8	14.0*
6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億(人民幣)	1,944.5	11.0*
	國有經濟		1,082.2	16.1**
	集體經濟		297.8	11.8**
	城鄉居民		238.1	20.8**
	其他		326.4	35.3**
7	貨幣供應(M2)	增長百分率		29.5
8	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	變化百分率		17.1
	城鎮CPI			16.8
	農村CPI			17.5
9	出口總值	億元(美元)	148.8	22.9**
10	進口總值	億元(美元)	132.1	14.2**
11	實質利用外資額	億元(美元)	48.4	11.0**
12	小學生淨入學率	%	98.5	
13	小學生退學率	%	1.49	
14	醫院床位	萬	2,836	0.2
15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	元(人民幣)	3,893	4.9*
16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元(人民幣)	1,578	5.3*
17	城鎮失業率	%	2.9	

* 實質增長率

** 名義增長率

數據來源：〈199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布〉，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96年3月7日。

目錄

編者的話	vii
作者及編者簡介	xi
1. 江澤民：謀求鄧以後的最高權威 由冀	1
2. 中國法律的發展與民法傳統 陳弘毅	27
3. 腐敗與政治 Andrew Wedeman(魏德安)	53
4. 社會民主的中國論說 Hans Hendrichke(杭智科)	85
5. 經濟發展與穩定和村民民主自治 Jean C. Oi	113
6. 中國對外政策中的主權：原則與實踐 任越	131
7. 台海兩岸的政治互動 明居正	159
8. 經濟 曾澍基	183
9. 土地與房地產管理制度 劉佩瓊	217

10. 國有企業的改革	
李志文	243
11. 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差距	
胡敦鐸	261
12. 一九九五年中國的農村經濟	
<i>Claude Aubert</i>	293
13. 中國人的人格與社會變遷	
張妙清、梁覺、張建新、宋維真、謝東	321
14. 改革開放後勞工對工作體驗及其意義的轉變	
<i>R. I. Westwood</i> 、梁淑美	343
15.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人口統計學	
鄭振權	395

1

江澤民：謀求鄧以後的最高權威

由 冀



1995年是中國高層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江澤民地位的上升和鄧小平的進一步隱沒，標誌著後鄧時代的開始。因為第三代領導的過渡性質，使得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多種傾向，所以後鄧的時代，是否能稱為江時代還難定案。然而在去年一年裡，江已經明顯地從組織建制上，加強他的權力基礎。黨政軍高層的人事更迭，進一步証實了江是人民共和國新一代的領導核心。雖說政治金字塔頂端的派系磨擦依然存在，隨著江的中心地位的確立，領導層的權力運作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既有別於天安門事件後，繼承政治中出現的僵持局面，同時又反映出黨內派系鬥爭，在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的過程中，所伴隨的不確定性。本章擬論証在過去的一年裏，高層政治在動蕩與穩定的搖擺中呈現出的某種新模式。

權力機制對繼承政治的作用

在中國的精英政治中，一個領導人要想施行其權力，建制性權威（institutional authority）與個人權威是兩個先決條件。雖然如此，二者卻不一定有其一必有其二。黨的頭面人物身居要職以加強權勢，然而僅僅執掌這些機構，卻並不能保證他成為毫無爭議的領袖。除了有形的職位之外，衡量一個領導人權勢的大小，還須看他是否擁有足夠的、能切實執行其命令的追隨者。至於從這種非正式關係中能獲得多大的支援，則通常要看他的資歷。於是，其組織建制性權威和其個人威望，就成了揆度一名領袖在統治層中的力量，以及他的前程的關鍵參數。無可爭辯，江澤民的地位在1995年上升了，在實現權力交接的最後階段，把上述二種權威結合起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可以趁元老們的作用減弱、其同僚尚無力與他競爭之時，利用建制性權威網羅支持者。這點可以從他處理和（1）黨內元老；（2）黨政機構；以及（3）同僚間的關係上清楚地看出來。

選擇起跳時機

中國所有具有最高權力的領導人，都通過佔據現存建制中的正式職位，來擴大他們的權勢。毛直至去世仍擔任着黨和軍隊的最高職位；而鄧是在確信他的繼任人，已強大到足以實現他的改革方略時，才放棄他最後的職務——中央軍委主席。因此，在分析中國先後實施的政治舉措時，建制性權威和個人權勢之間的關係，就成了核心問題：黨的元老們過世，留下了真空的權力，現任領導人得以主持一個正式機構，以加深其資歷，並逐漸填充這個權力真空。因此，比起個人權勢來，建制性權威的重要性開始與日俱增，並成為衡量領導人是否正統的尺度。

1995年的事實證明，政治生態對於繼任者發展其權力基礎，是至關重要的。當黨內元老們健在的時候，接班人過度培植個人班底猶如玩火；改變既定方針則會被視為忤逆恩師。江的兩位前任：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受過幕後做手腳的黨內元老們的鉗制。江和其他第三代領導人一直保持低姿態，1995年為他們提供了最佳機遇：陳雲於4月裡去世；至於鄧，整年裡傳出的只有他健康狀況一日不如一日的消息。諸位「德高望重」人物的淡出，擴大了新一代領導人制定政策、安排人事的空間。問題集中到了啟動全套捭闔之術的時機選擇上。

與既得利益集團合作

江得以在1995年聚積並擴大權力，是因為他順應了中南海的權力均勢，即1989年6月以來，中央各種政治力量所達成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協調中國各關鍵的政治經濟機構（即部門利益集團）的政策；在政治思想和態度層面，聯合溫和改革派和維持現狀派的部門領導人；順導中央與地方的利益衝突，緩和一線領導人與黨內元老間的爭執。當高層領導人認識到，無節制的派別活動最終導致共同毀滅掉時，他們服從了一種妥協政治，結果在九十年代初，出現了一種在強制與和緩政策並行下的不安穩的均勢。而上述那種制度與個人交互作用的網絡關係，則為這一均勢鋪平了道路。